

经济学界的成功“跨界”者——从“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所想到的

■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周有光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术大师。他不仅是语言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因为 50 岁之前,周有光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在金融学方面有不少建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1955 年,年近 50 岁的他去参与文字改革会议后便改行语文。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可以说,周有光是“做到了家”,有“光”,是取得极高学术成就的典范。

学术界的“跨界”者都是多学科的“高人”,凤毛麟角。经济学界还有两位真正“半路出家”的成功者——成思危和茅于軾。成思危生前还担任本报总顾问,他的前半生一直从事化学工业,官至化工部副部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并将风险投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本报学术顾问茅于軾,长期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是典型的技术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茅于軾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后来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由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成思危和茅于軾的“跨界”难度之大,我们可以想象:一是“半路出家”,本身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二是从工程技术领域到经济学领域,跳跃得有点不可思议。但他们都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学术成功。

实际上,经济学界还有几位杰出的“跨界”者。

2017 年 1 月 14 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驾鹤西去,享年 112 岁,创造了社会科学界的最长寿纪录。各大媒体对此纷纷报道,悼念追思。

顾准作为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作为历史学家,他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厚的史学遗产,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理论三个问题上。顾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深刻批判了目的论、一元论与线性思维及其教条化的历史神学,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非逻辑性。他坚持独立研究,不以权威的结论为依据,敢于怀疑,善于思索,尊重史实,坚持实事求是。顾准的史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善于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善于进行科学的理解分析,善于探索解答时



代课题的不同方式。

陈豹隐是我国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教务主任兼经济学系主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等。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从事理论著述、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为中文《资本论》最早译者。1956 年,陈豹隐被评为一级教授,与陈岱孙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名经济学一级教授。陈豹隐“跨界”了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和文学领域。作为哲学家的陈豹隐,热衷方法论之学。1919 年他即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即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1928 年翻译出版了爱里温德的《科学的宇宙观》,1932 年进一步出版专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并撰写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一般社会科学上的地位》等多篇论文。在政治学家的陈豹隐,早在留日时即热心国内政治事务,发表了《欧洲大联邦论》、《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抱影庐陈言》等文。1925 年他挑起了著名的“联俄与仇俄”之争,徐志摩、巴金等名流纷纷卷入。专著《新政治学》和《现代国际政治讲话》则是他政治学思想的集大成。作为法学家的陈豹隐,早年先后发表了《国宪论衡》、《护法与弄法之法律学的意义》、《法律与民意及政治》等

第八届空间经济学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

应该基于怎样的角度思考京津冀协同发展策略,如何实现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优化?应该如何破除大城市发展困境,重构未来中国城市体系?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会有怎样的新思路和新对策?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有何特点,如何在中国应用?日前,第八届空间经济学年会召开,180 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南开大学展开研讨。

本次大会主题为“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区域协会等 40 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党政机关代表与会。

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在致辞中说,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学校的优势学科,南开区域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广大国内外优秀学人的支持。空间经济

学的发展,对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与会专家深入研讨、互相启发,共同为推动经济学的创新,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与政策启迪。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连锦聚认为,空间经济学对复杂的国内外关系以及国内经济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它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特点,前景广阔、大有作为。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之下,青年经济学人有责任将空间经济建设好、发展好,为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做出应有贡献。

第七届全国空间经济学年会执行主席、安徽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骥表示,虽然西方的空间经济学已经“步入中年”,但它在中国的研究方兴未艾。2009 年至今,越来

越多的研究机构、高校、专家学者参与空间经济理论研究,十分令人欣喜。但是,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仍有不足。“希望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空间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学科真正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马骥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校长助理刘秉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北京大学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澜,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吴殿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赵作权,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财经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伏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教授杨开忠,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暨南大学教授覃成林,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赵儒煜,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郭爱

君,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长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林善浪,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胡晨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文余源等分别在大会开闭幕式环节作专题报告。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围绕“国家战略与空间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与经济增长”“空间拓展研究”“空间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空间创新与绿色经济”“城市群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分组讨论。

据悉,本届年会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空间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共同承办。自 2009 年以来,空间经济学年会已成功举办 7 届,旨在促进国内外空间经济研究学者交流、探讨这一新理论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其发展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使之对中国相关经济理论以及中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吴军辉)

业内专家学者看 2017 年中国经济

金春雨、张龙: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金春雨、张龙在《中国工业经济》2017 年第 1 期撰文指出,近年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典型和非典型政策之间频繁切换,这种“异质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动态影响,导致常参数模型所刻画的溢出效应缺乏实际的经济意义。为此,作者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宏观经济、私人经济和金融市场三个角度来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动态影响的表现形式及背后的机理。研究发现,动态影响体现在:一方面,不同时期美联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负向影响,意味着不同时期的同向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反向影响;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私人经济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分别呈现递减、递增、平滑现象。动态影响的根源在于不同时期传导机理的差异。在固定汇率下,美联储通过影响中美利差作用于中国的资本与金融账户,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在浮动汇率下,美联储通过干扰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来影响中国的经常账户,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因此,建议中国人民银行缩小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结合数量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美联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建议宽松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并行以及缩减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来应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李晓华:打造区域发展新动能的四大关键点

李晓华在《区域经济评论》2017 年第 1 期撰文指出,寻找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要抓住四大关键点:一是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既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影响,供给能力与需求不匹配也是重

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快速提升,而且产业转型的压力也对生产技术、原材料、仪器设备的优化也产生了新要求。但是由于中国供给能力滞后,许多中高端需求在国内不能得到满足,因而不得不依赖进口。如果考虑到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现状,只有那些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需求才能被实现,供给能力的低下就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通过创新加强产业基础、改进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地适应国内需求升级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被削弱的时候,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吸引外资等手段,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开始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并且对消费品、投资品的需求急剧放大。然而,由于国内产业基础薄弱、产业规模弱小,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工业产品不能实现自给,需要大量依赖进口。对于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购买力弱,它们需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工业品,这恰恰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当前中国的钢铁、有色、建材等不少产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能够与国外高速增长市场有效对接则能实现双赢。三是抓住新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和产业。四是促进区域间经济协作。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

国,这一特征决定了全国不同区域在自然资源、交通区位、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人口数量、工资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经济呈现东部发展水平高、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低的梯度发展格局。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应该加强产业协作,譬如建立产业供需信息平台,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发展利益分享的飞地经济等,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国内的欠发达地区转移,既为东部发达地区留出“腾笼换鸟”的空间,又能够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

朱一中、杨莹:土地发展权的性质

朱一中、杨莹在《经济地理》2016 年第 12 期撰文认为,土地发展权不同于土地使用收益权。土地发展权与土地使用权的根本不同在于,土地使用权总是与特定宗地相联系并固化与该宗地,不能进行空间转移,土地使用的对象是具体的“土地”,它是一种“有体物权”;而土地发展权在法律属性上是受行政管理制的土地开发利用权,它是一种开发容量许可权,它指向的对象是“开发容量”而不是土地本身,科研与土地实体分离而进行空间转移。土地发展权作为政府基于行政权,运用土地用途管制手段所发放的土地开发容量许可,与我国法律传统“有体物权”具有本质差别,而与知识产权这种新型物权更具有相似性:例如虽然土地开发活动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但土地发展权是作为现代产权概念出现的,不是从来就有的。同样,知识产权是一个久远的人类所有,但知识产生是从来就有,是一个现代产权概念。只有“土地开发容量”这种无体物权具体地应用于某一地块,它才具象化为土地开发利用形态。同样,只有当知识产权应用于生产,它才会具象化为某一技术产品。正是由于土地发展权是一种抽象的无体物权,它才具有可以进行空间转移、可独立行使的财产权性质。土地发展权可脱离土地实体而进行支配的性质具有关键的作用,这样的权能范围才能保证其发挥利益界定的功能。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物权,除了具有物权的排他性、支配性、收益性等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形式多样,市场机制是决定土地发展权价格的最优机制。

用,这样的权能范围才能保证其发挥利益界定的功能。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物权,除了具有物权的排他性、支配性、收益性等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形式多样,市场机制是决定土地发展权价格的最优机制。

坤洁:需要研究“大健康经济理论”

坤洁在《新理论》2016 年 24 期撰文认为,健康是涉及每个公民的人权。为维护公民健康,需要制定健康政策,从企业、市场、政府,完善提高健康科学认识,实施现代健康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健康经济学”,为完善健康政策,提升健康科学,推进健康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譬如,现在餐饮业就有不健康的行为:为顾客提供“超标”的菜品,食盐过量,脂肪过量,是否是享“口福”了,但是并不健康。餐饮业,人应该从顾客的健康出发,生产提供脂肪食盐不过量的菜品,而不是一味通过满足顾客口味提高销售量。作者认为,我国医保基本覆盖全民,但政策漏洞多,管理问题多,亟须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企业生产的消费品,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必须符合健康的原则。比如,有的童装含甲醛,有的乳制品含三聚氰胺,等等。企业管理必须增加健康标准管理,把健康经济纳入企业发展的科学范畴。从公民角度看,衣食住行,也需要树立健康经济观。买菜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因地制宜,科学选择,既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又使身体健康,减轻经济负担。穿衣打扮,既要时尚美观,但更要健康经济。健康是大概念,是微观问题,也是宏观问题。健康经济包括卫生、饮食、锻炼等问题,也包括相关的政策问题;既有身体健康,也有心理健康,更有性健康问题。健康经济是一门新学科,是与百姓密切相关、与企业生产、与政府管理都有关联的新学科。希望更多的人从事健康经济学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大有作为。(卫星 编)

文。作为文学家的陈豹隐,柳亚子在《新文坛杂咏》十首中将其誉为新文坛十大将之一,他先后创作了戏剧集《齐东恨》、《恋爱舞台》和小说集《蓄色的心》及大量单篇小说、诗歌和小论。其间,他还引发了著名的“有律现代诗”和“新写实主义”之争。他兼作文言诗和白话诗,诗歌创作贯穿了他的一生。

于光远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说明于老“跨界”得范围更广。于老说过:“我的大学生涯是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度过的,可见我一生开始并没有想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的意识。但是,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到革命不仅需要科学的知识,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于是我在保持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同时,又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钻研,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了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经历展现了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即兼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但研究兴趣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本报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赵人伟在《经济研究》2013 年 12 期撰文评价于光远是“跨学科探索的宗师”。“于光远不仅提倡跨学科的交流,而且自身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界,他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素养是非常突出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他耕耘最多的是政治经济学;他从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可以说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哲学研究。”于老的“跨界”,使得他在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其研究领域的广泛度一样,于光远在这其中的影响都极为深远。于光远无愧于“跨学科探索的宗师”,这样的“跨界”或许是空前绝后的。

(上接 02 版)

B 组第三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共有四位学者发表演讲,分别是日本神户大学 Lex Zhao、中国台湾政治大学胡伟民、内蒙古大学杜凤莲和上海财经大学鞠建东。会议由鞠建东主持。

Lex Zhao 的报告题目为“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首先,他介绍了中日之间的四大争端。第一,领土的争端。他说:“如果有一个国家 A 和 B 可以在一块大的土地上合作,那么整个“派”就会增大;但是如果两不合作,有争端,这会成为有一个成本的争端。”第三国的介入,会使领土争端变得更为复杂。争端的第二个方面为历史问题。日本的两次对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痛苦,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发展超过了中国也会引起大众的嫉妒心理。争端的第三和第四方面分别为民族主义和体制差异。中国经济的崛起使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而中国的崛起使日本在制度之间的差异也使两国之间的争端加剧。

胡伟民的报告题目为“中国 2008—2012 年抵制汽车销售的经济分析”。在历史上,中国从 1905 年开始产品抵制,抵制的产品包括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品。根据这一史实,该研究提出了问题:在相关的历史阶段,抵制有什么作用?抵制在地域上方式和效果有什么区别?他从不同的地区入手进行分析,与前海洲里相比,从来没有被占领过的省份抵制效果最小;被小面积占领的省份中,抵制的效果最大;大规模被占领的土地几乎与前海洲里国的抵制效果是一样。研究发现,通过抵制,日本产品减少,中国本地产品会增加销售和市场份额。

杜凤莲的报告题目为“角色与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对蒙关系影响”。报告分为五部分: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中蒙贸易,中蒙关系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对中蒙关系的影响和进一步研究设想。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加大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深度融合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6 年 6 月,中、蒙、俄三国元首签署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更加促进中蒙之间贸易的发展。中蒙关系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46 年—1961 年,中蒙关系的开端是信任与合作;1962 年—1985 年,中蒙两国关系停滞;1985 年—1994 年,中蒙关系正常化;1994 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蒙古,拉开中蒙关系的新时期。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崛起对贸易的影响是正向的,与中蒙关系发展阶段基本一致。该研究将进一步利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政治语言背后的真实想法。

鞠建东的报告题目为“华夏共同体:全球贸易新常态与全球治理新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增长放缓,除了周期性变化因素之外,世界贸易增长和世界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被称为全球贸易的新常态。新常态是对全球贸易的巨大挑战。经济放缓使得“美国中心”向“三级中心”转换,欧盟为一级,美国为第二级,亚太为第三级。在新的经济秩序中,中国担任的角色不会是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美国也不会继续担任“老大”的角色,而是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鞠建东提出了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概念,关注不同国家政治和文化的不同和趋同,强调更多统一和合作。(原荣荣) 0